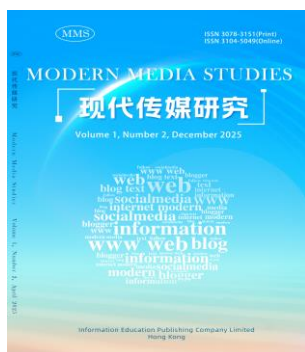




MMS

Modern Media Studies

MMS, Vol. 1, No. 1, 2025, pp.93-104.

Print ISSN: 3078-3151; Online ISSN: 3104-50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1.09>



生成逻辑、机制构建与文明互鉴 ——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多维研究

邓爱芹 (Deng Aiqin), 张连桥 (Zhang Lianqiao)

摘要: 在全球文化治理体系转型且文明互鉴程度不断深化的当下, 建构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成为破解区域文化认同困境的重要实践。本文将从多维视角揭示该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机制创新及交流互鉴价值。研究发现, 地缘基质提供物理空间、族群渊源构建生物学纽带、戏剧播迁触发动态生成, 在这三方面的作用下形成多向度交织的共同体生成逻辑。再者, 政府、高校和民间三方协同、“4+1”戏剧展演进路以及“接触-对话-共识”三阶文化认同模型的机制创新, 构建起既有制度弹性又有文化张力的共同体交流模式。最后, 共同体在东方美学重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全球文化治理方面实现了价值跃升, 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传播秩序和全球文明对话新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戏剧共同体; 生成逻辑; 机制构建; 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 邓爱芹, 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 研究方向: 文艺学、国际中文教育。电邮: 1575286303@qq.com。张连桥 (通讯作者),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期刊评价、教育评价研究。电邮: 504078138@qq.com。

Title: Generative Logic,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the China-ASEAN Theatre Community

Abstract: Ami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deepening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SEAN Theatre Commun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practice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log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reciprocal learning value of this community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munity's generative logic aris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three dimension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s providing physical space, ethnic ties establishing biological bonds,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atre triggering dynamic formation. Furthermor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such as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civil society; the “4+1” theatre exhibition development pathway; and the “contact-dialogue-consensus” three-stage cultural identity model—have established a flexible and culturally resonant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Finally, the community enhances its value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stern aesthetics,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offering a Chinese approach to fostering a more inclus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der and new paradigms for global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Keywords: Theatre community; Generative logic; Mechanism constructio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uthor Biography: **Deng Aiqi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Guizhou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Research Interests: Literature and Ar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mail: 1575286303@qq.com. **Zhang Lianqi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Jour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mail: 504078138@qq.com.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舞台艺术，也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戏剧互动由来已久。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化，双方的戏剧交流也成为其创新发展和共生理念不断深化的重要助推力量。由此形成的戏剧共同体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中国与东盟各国基于文化交流的事实基础和文明互鉴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生态系统。其以戏剧对话消弭文化隔阂，以审美共鸣凝聚情感纽带的特性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康海玲结合时代使命、形成条件、戏剧传播三个方面阐述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以下称“戏剧共同体”）是戏剧资源共享的新型模式，是国际关系“提质升级”的催化剂，是民心互通工程的有效途径，“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康海玲，2019, p.23）同时，戏剧共同体以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以下称戏剧周）为平台，许燕滨则基于戏剧周的实际运作和实践成果剖析戏剧文化交流品牌的创建方法和增加品牌传播效能的策略，强调“必须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挖掘戏剧文化内涵，探索产业发展，在南宁打造中国—东盟戏剧集散中心，扩大宣传推广，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文化和经济双赢局面。”（许燕滨，2024, p.25）此外，黄朝阳考察了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现状，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当前的现实瓶颈，即交流深度不够、机制化水平需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创造性提出“建立‘拓展’和‘深耕’人文交流范式、推进区域公共文化外交新理念和举措、多方位营造人文交流合作的有利条件等入手，破解中国—东盟文明交流互鉴困局，开创中国-东盟合作新格局。”（黄朝阳，2024, p. 104）

以上研究对戏剧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发展策略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意义深远。但也存在现象整理较多、动态关注较少、研究视野较窄等局限。本研究将现象归纳与内在机理探讨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衔接、区域视角与全球性视角并用,以此回应共同体在地缘、族群与动态传播下是如何生成的,其交流机制在多元主体协同、展演创新和文化认同构建下是如何实现的,其超越区域范畴为全球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是如何提供的。

一、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三重生逻辑

戏剧共同体的构建蕴含着复杂深邃的形成逻辑,单纯依靠戏剧交流史梳理难以窥探全貌,不可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因此需要在地缘政治学、基因考古学、文化流动学等方面着手,还原历史积淀与当代实践的深层关联,揭示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如何成为天然的文化走廊,同源分化的族群关系如何延续共同的文化基因,古往今来的戏剧播迁又怎样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东方戏剧文化圈。

(一) 地缘基质奠定了戏剧传播的物理基础

19世纪初,美国牧师哈瓦杜·玛鲁可姆(Howard Marqoom)在《东南亚之旅》中正式提出“东南亚”这一地理概念。不过地缘基质的历史意义不只是单纯的地理描述那么简单,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对欧亚大陆沿岸区域特殊地位进行了系统阐释,他指出“世界实力的中心除北美东部沿岸地区外,其余三块均在欧亚大陆沿岸的边缘地区。”

(Nicholas J. Spykman, 2014, p. 5)东南亚是欧亚大陆的“内新月地带”,其地缘价值具有双重属性,也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言,这是“彼此接触并产生不间断关系的空间”(Mary Louise Pratt, 2017, p.10),即文明互动的“接触地带”,是贯通古代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立体枢纽。独特的区位特征使其成为海陆文明交织的能量场并持续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毗邻性塑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陆上中国西南部的滇桂走廊和中南半岛各国形成了连续的山地文明带,滇南喀斯特地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之处有天然地理连接,且北回归线两侧的季风气候孕育出相似的水稻耕作文明。地理的连续性促使文明演进中有双向的文化渗透,横断山脉六江并流区既是“蜀身毒道”的民间商路也是长江文明和湄公河文明的碰撞区域。考古表明“滇池周围出土的有肩石斧和广西瓯骆越文化出土的楔形有肩石斧相似”(陇艺梅, 2019, p. 20)且广西出土的“翔鹭纹铜鼓”“雷纹三角形带纹铜鼓”和越南北部东山村出土的铜鼓在羽人纹、太阳纹、几何纹等纹饰上高度一致。这些连接反映出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在物质文化、精神信仰方面的深度交融,并在共同努力下构建起超越地理疆界的文明共生体系。

中国环南海的弧形海岸线和东南亚岛链在海上构成互补性的海陆系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

(班固, 2007, p.1648)自此之后,这条贯通北部湾、暹罗湾一直到马六甲海峡的海路网络,不仅输送青瓷和香料还承载起艺术形态跨区域传播的功能。吴昌稳研究“南澳1号”出水的大量瓷器时发现,其外观图案“人物故事一般以元曲为本,人物造型多为宋装,偶尔也可见元代装束,明显受到元代勃兴的戏剧艺术的影响。”(吴昌稳, 2019, p.82)在这里,海上丝路成为戏剧文化传播的加速力量,为双方搭建了跨越山海的联系渠道。

在陆海双重地缘优势的助推下,双方的戏剧交流日益紧密。正如萨义德所言,“所有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Edward W. Said, 2003, p.4)因此,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广泛接受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等多元文化影响,形成具有“文化杂交性”(John Tomlinson, 2002,

p.207)的艺术形态。中国也以开放姿态汲取东南亚艺术养分,形成文化交往的环流态势。另一方面,在融合过程中,不同文明进行文化选择与重构,把外来戏剧范式创造性转化成独具本土特质的艺术表达。这种双重演化不只是包容接纳异质文化,更突出表现在在地化的创新实践中,从而形成承载历史记忆又符合现代审美,既具有本土风味又具有异域特色的跨文化戏剧交流典范。

(二) 族群渊源构建了文化认同的生物学根基

族群迁徙为戏剧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生物学基石。早在《淮南子》《后汉书》就有东南亚相关记载,“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旴谷,西至三危……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范晔,2012,p.2847)。学界对“越裳”具体位置解释不同,其中一种认为其位于老挝、缅甸和中国西南地区。据《大越史记全书》载,百越祖先为炎帝三世孙帝明,帝明重孙崇纛与仙女瓠姬结合生百子,建立百越王国。《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性。”(王介南,1998,p.12)百越民族分布范围广,北到湖北中部,南至中南半岛,西达缅北和印度,东抵长江沿海。考古学发现,我国南方百越民族创造的有段石铳、几何印纹陶、青铜靴等在东南亚地区也存在。民俗研究表明,百越民族的图腾崇拜、猎首风俗、文身习俗、拔牙习俗、干栏建筑与东南亚民族相通。民族分布显示,中国的壮族、苗族、瑶族、傣族、彝族、布依族等16个少数民族与东南亚跨境而居。由此可见,东南亚各族与中国华南的百越民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基因记忆的同源性为戏剧艺术的传播提供了生物学维度的实证支撑。这一印记首先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出来。相关学者在研究南岛语系时指出,其起源与扩散地“指向中国台湾及其邻近地区。”(杜树海、郭健新,2023,p.43)中国台湾南岛人是“新石器时代由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出去的,进而由中国台湾迁至南洋诸岛。”(邓晓华,1994,p.36)南岛语系在中国台湾原住民语言、菲律宾语、马来-印尼语等语言里留存的底层词汇,与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存在语言基因的对应关系。其次,现代分子人类学揭示的生物学基因记忆是最直接的证据。研究者提出“父系单倍群O1a-M119及其支系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沿海和岛屿的南岛语、壮侗语和汉语人群中高频分布。”(郭健新、邓晓华、王传超,2023,P.41)Lum, John等研究者分析了南岛语族母性线粒体“以B4、B5a、F1a等单倍群为主,并认为南岛语族与东南亚岛屿人群关系更密切,都起源于印度尼西亚东部。”(Lum, John, 2000, P.156)语言和血脉中的记忆密码,见证着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族群和东南亚各族群纵横古今的基因对话。

族群迁徙和基因流动恰似戏剧共同体的年轮,层层叠叠搭建起文化遗产的记忆密码。先民们的跨地域迁徙,既是血脉基因的流动,也是戏剧种子播撒的机遇。正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第三空间”理论所揭示的,在文明交汇区域,这种文化记忆催生出有着遗传连续性和文化创新性的戏剧谱系,其融合性特征很好地诠释了文明互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质内涵。

(三) 戏剧播迁激活了共同体的动态生成

中国戏曲扎根于本土,经丝绸之路流传到海外其他国家,在异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并产生了移植、变异等情况。东南亚是华语戏曲重镇,华人华侨多集中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特别是明代中叶以来“下南洋”浪潮,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因此,华人在文化传播里担当起弘扬和传承的重任,从而最大程度拓展了中国戏剧在海外的发展空间,促使华人戏剧在东南亚赓续不绝。

除了具有国剧地位的京剧外,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的戏曲在海外表现最是突出。当地华侨华人称其为“广府戏”和“福建戏”,“‘广府戏’包括粤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等;‘福建戏’

包含高甲戏、莆仙戏、闽剧、歌仔戏、梨园戏、闽西汉剧等。”（康海玲，2017，p.73）作为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为处于“两栖”状态的华人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华人族群文化上的双重纠葛，“一是传统的关乎祖辈的‘华性’，一是现实的关乎自己的‘在地’性”（康海玲，2017，p.51），促使华人面临双重问题，即“本土与故土，同化与异化的困境。”（周宁，2007，p.5）一方面他们保持对具有“原根”意味的乡音乡曲的认同和坚守，一方面又要使自己“他者”身份在入籍国合法存续下去。因此在保留中华戏曲精髓的同时，中国戏曲发展成为“中为泰用”“中为马用”“中为新用”等新型舞台形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比如潮剧在泰国用泰语演唱，用泰语音韵创曲，形成一批泰语潮剧剧目《八仙过海》《杨门女将》《包公铡侄》等，并在泰国曼谷形成海外潮剧中心。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薛仁贵的故事及金庸的武侠故事在延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更换人物姓名为印度尼西亚名字，吸引了印尼观众的观赏，亦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和形变。

传统戏曲历史久、积淀深，华语话剧与之相比要年轻得多。辛亥革命之后话剧发展迅速，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启蒙民众、传播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此时，东南亚出现许多华语话剧社团，其话剧从华人身份立场叙事，让东南亚各国反思并纷纷号召“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掀起“南洋新兴戏剧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话剧承担起团结侨胞共同抗日的使命，《中国妇女》《阿Q正传》《放下你的鞭子》频繁上演，东南亚救亡图存的戏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抗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面临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处理殖民统治遗留问题和推动民族独立等诸多挑战，华语话剧逐渐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华文教育慢慢复兴，华语话剧也逐渐成为校园教学内容。新时代“多元共美”文化理念提出后，华语话剧得到政府支持并被一代一代东南亚华人传承坚守。

地理环境、族群渊源与文化互动这三重因素有机融合，促使戏剧共同体得以形成。东南亚位于文明交汇点，枢纽性地理位置，为戏剧艺术跨境传播提供天然渠道并为区域戏剧交流奠定地理基础。族群渊源带来的原始记忆让不同民族在戏剧传统里追溯共同情感源头，血脉相连的基因基础给戏剧共同体注入持久生命力。戏剧播迁流变时不断进行本土调适，吸收异质文化元素实现创新转化，最终形成同根异彩的艺术生态，推动戏剧共同体在动态平衡里持续演进。

二、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的机制构建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其构想巧妙借用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并希望延续古丝绸之路联通中外、文明交融的精神内核，开创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繁荣的新局面，最终达成利益交融、命运相连、责任共担的新型合作关系。文化互动作为增进理解的桥梁，为这一关系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民意根基。其中，戏剧艺术凭借其鲜活的表演形式、强大的现场感染力、独特的符号承载功能成为双方延绵至今的交流形式。因此，戏剧艺术理应肩负起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心灵互通、推动文明对话的时代使命。

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戏剧交流前沿阵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缘和亲缘禀赋，促进形成了政府引导、高校支持、民间参与的合作模式，并与各国共同打造了戏剧周“4+1”的展演进路，为戏剧交流提供舞台的同时，构建起了文化接触、情感互动、价值深化的三阶认同模型。这种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跨文化交流网络，既让丝路戏海再次扬帆起航，又凭借制度化的交流机制、专业化的展演平台、渐进式的认同建构不断推动“同频共振、同声相应、和合大同”（郭少东、吴潇，2023，p.3）的中国—东盟戏剧文明繁荣昌盛。

（一）三方协同共建跨文化治理体系

政府在共同体建设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中央政府以多层级政策体系构建起“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制度框架。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把文化交流首次纳入民心相通工程。次年,原文化部颁布《“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将“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品牌项目制度化,确立了艺术跨国合作的实施路径。在此之上,《“十四五”“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不断升级,进一步擘画出对外文旅交流的蓝图。地方层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构建次级政策网络,把国家战略具体化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示范区”实践,并且《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打造成面向东盟的文化枢纽项目。南宁市加快落实脚步,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中心的若干措施》,将戏剧周提升为区域性人文合作的核心载体。这种“中央定调—地方落实”的传导链条,既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知识生产、战略咨询与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高等院校承担起衔接政府规划与民间实践的重任。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的创建就是典型例子,该联盟由中央部委和东盟大学联盟共同发起的跨国知识协作体,借广西大学的区位优势,整合了27家跨国学术机构,形成“东盟+1”的成员框架。其运行逻辑是各国与智库合作联盟的战略资源直接对接,实现学术研究向社会实践的转化。同时,云南艺术学院主导的“彩焕南云——2024中国与东南亚数字艺术论坛”是数字技术赋能教育与人文交流的显著例证。该论坛把中泰马等国艺术院校精英聚合起来,围绕数字媒体技术研发、跨学科创作实践、国际化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对话。它的创新价值不只是搭建区域性数字艺术协同创新平台,更通过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交叉研究,推动技术、学术、艺术的深度融合。

民间力量发挥其自身优势,是戏剧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以广西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为例,该民间组织与东盟多国艺术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并且通过“戏剧+”跨界合作模式成功策划多次跨国联合展演。此外,区域性戏剧会馆的贡献也异常突出。马来西亚檳城潮艺馆通过整理濒危剧本、培育新生代演员,构筑起中马戏剧文化交流的民间通道。泰国潮州会馆戏曲组借由传统节日演出,将局限于华人的潮剧表演拓展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新加坡敦煌剧坊探索将本土音乐元素和现代表现手法融合,使传统粤剧突破族群和年龄边界,焕发新的活力。这些民间组织生动的本土化实践,自下而上奠定了戏剧共同体的民众基础。

（二）“4+1”板块形成戏剧周展演路径

戏剧周是南宁市着力打造的外向型文化交流品牌,截至2025年1月已成功举办11届。历届戏剧周“以倡导文化先行、搭建传播平台、加强文化交流为基础”(郭少东、吴潇,2023,p.4)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设置,各具特色的参赛团队,高潮迭起的竞演效果吸引了来自各国的艺术团体、戏剧爱好者、专家学者和观众群体。并且戏剧周坚持“4+1”的展演进路,即“演(演出)、研(研讨)、展(展览)、赛(竞赛)+大联欢”的模式,以此打造出一个多元文化释放活力的戏剧盛典。

第一,戏剧周呈现出满园春色、姹紫嫣红的戏剧演出景象。自2013年举办以来,汇集了我国各省及东南亚11国的优秀戏剧作品,共吸引了344个文化机构、艺术院团参与,演出315场、戏剧工作坊97场,涵盖了越剧、昆剧、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淮剧、粤剧、彩调剧、花鼓戏、滇剧、婺剧、秦腔、音乐剧、藏戏、邕剧、莆仙戏、木偶剧、潮剧、改良剧、歌剧、伊给剧、儿童剧、孔剧、高甲戏等剧种。通过线下演出、线上展播的方式共享戏剧盛宴,并且线下观众达到50余万,线上观众达到890余万。历届戏剧周演出既有中国特色传统戏曲,又有极具东南亚地方色彩的新颖剧

种；既有经典剧目的传神再现，又有现代话剧的生动表演；既有实力剧团的演绎，又有新生校园力量的加入；既有各国的特色剧种，又有国内外合作剧目，最终呈现了各国优秀剧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同台展演和文明对话，有力推动“戏剧之桥”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纽带。

第二，戏剧周举办深化戏剧理论、加强戏剧合作、共谋戏剧发展的高峰论坛和学术研讨。其目的是汇聚中国和东盟国家戏剧界的专业演员、导演、编剧、学者、艺术家，共同探讨戏剧联合创排与展演、传统戏剧转型与数字化建设、人才培养与戏剧传承等议题，分享推动戏剧发展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成功经验，为戏剧艺术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届时，各国专业人士来到南宁，新加坡新跃大学高级研究员蔡曙鹏、越南国家剧院院长阮世荣、新加坡戴溪陵、马来西亚陈福庆、越南国家木偶剧团团长阮进勇、泰国艺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妮帕·索帕沈丽、柬埔寨文化部专家ChanTo、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员毛小雨等专家在论坛上发表高见，为理论研究的推陈出新与实践经验的深化拓展创造了条件。

同时，研讨会成功促成了“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交流机制”和“中国-东盟戏剧合作交流机制”的建立，推动了共同研究项目的开展，加强了各戏剧团体和各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了双方常态化交流模式的形成。双方开展戏剧艺术研究，成果丰硕，发表了《满怀自信的亚洲戏剧文化交流范本——关于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成功举办的思考》《“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构建》《文化尊重 多元共汇大美——论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的人文交流实践》等论文，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剧传播》《东南亚戏剧概观》《南宁非遗大典》（中英文）《邕剧戏评》《中国-东盟戏剧剧本互译丛书》《广西粤剧百年图史》《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的世界戏剧创作》等著作，实现了“东张西望”的突破，为中国与东盟戏剧理念创新和戏剧创作实践提供指引，对构建东方戏剧话语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戏剧周带来了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工作坊和各类展览。工作坊以传统戏剧技艺、戏剧表演与创作、舞台美术与设计这三类为主。比如越南水上木偶戏工作坊、东盟戏剧剧本创作工作坊、中国传统戏曲音乐工作坊、即兴戏剧表演工作坊、中国—东盟戏剧表演技巧工作坊、中国传统戏剧服饰设计工作坊、中国-东盟舞台美术设计展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以开放、直观、互动的方式帮助实现戏剧知识的普及、兴趣的培养、人才的选拔、艺术的传承、价值的塑造等，为戏剧艺术的长远发展奠基铺路。

戏剧周期间，观众们还可以沉浸式参观各类戏剧展览。综合性展览如“戏剧周十周年回顾展”，梳理了这十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表演、学术研究、剧本创作等方面的成果，是戏剧共同体建设的珍贵回忆；中国—东盟艺术展汇聚了不同国家的戏剧表现形式，是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平台。专门性展览如中国—东盟微电影展览以“民俗和戏剧”为主题，呈现了五彩斑斓的戏剧文化；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聚焦于承载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旨在保护和推广这些被遗忘的艺术；“千人千面”——粤剧面谱展，陈列了 100 多副精美的粤剧面谱，既体现了参展者的匠心，也展示了粤剧发展演变的过程。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门性的展览，都为戏剧爱好者提供了文化体验、知识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场所，促进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第四，戏剧周组织了以赛促学的戏剧表演竞赛、以评促演的剧评会和票友会，突破了传统单一的演出模式，巧妙地将演出与竞赛、与评论结合，打造了一场演出者高度重视、观众积极参与的综合性艺术盛会。以赛促学的戏剧竞演，为国内外艺术团体提供了高水平的切磋平台，点燃了各国艺术家的创作与表演热情，推动戏剧艺术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剧评会和票友会则增进了演员、编导、观众、评论家的互动，帮助观众获得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和多元解读，同时演员和编导的创作

能够及时予以反馈。双方真诚的交流推动了戏剧艺术的发展繁荣。

第五, 戏剧周打造了多元共融的“大联欢”文化盛典。作为戏剧周的压轴板块, “大联欢”以共演、共创、共享为宗旨, 通过国际合作, 打破传统戏剧表演的国界与剧种壁垒, 为多国艺术家提供了联合创演的舞台, 更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跨文化戏剧对话空间。2014年, 中国与东盟五国艺术机构联合创排的东南亚史诗戏剧《罗摩衍那》, 开启了中国-东盟合作演剧的新模式。2018年, 越南丽玉剧团根据曹禺先生的经典名剧《原野》改编呈现了越南版《金子》, 展现了经典文本跨文化移植的无限可能。该剧既忠实呈现人性挣扎的主题, 又契合当地观众的审美期待, 是中外戏剧文本深度合作的成功案例。此后, 该剧团不断尝试, 其改编剧《雷雨》同样好评如潮。“大联欢”经过十余年的耕耘, 已发展成为沟通戏剧成果的重要桥梁。其以戏剧为媒, 既呈现“各美其美”的文化多样性, 又以“美人之美”的平等对话培育起“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不仅深化区域间文化互动, 更为中国-东盟人文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例。

(三) 三阶递进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培育

戏剧周是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接触的重要场域。接触的过程就是承认彼此的存在并加深了解的过程。各国戏剧艺术家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这一契机, 全力以赴地展示本国的艺术特色与文化精髓, 并在相互欣赏中达成求同存异的文化共识。中国皮影与印尼哇扬皮影既有特色故事的不同表达, 又在光影交错中达成和谐; 中国川剧脸谱与泰国孔剧的面具既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又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的彩调剧与越南水上木偶戏既有思想的灵动性又有剧种的差异性。正是它们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演绎, 化抽象的文化符号为具象的审美体验, 并在相互凝视中获得他者的镜像反馈, 以此打开认知视野, 实现戏剧艺术的彼此启发与滋养。

接触是构建文化认同的萌芽阶段, 而深度交流则是促成文化认同质变的核心环节。戏剧作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 其对话的实质是不同戏剧审美体系的冲突调适与创造性转化, 从而帮助彼此在多元文化生态中获得持续演进的不竭动力。戏剧周上演的嘲剧《观音氏敬》正是中越文化相互渗透的生动实践。主人公氏敬被婆家逐出家门, 又遭村民误会与氏牟有染。在饱受笑骂的困境下, 氏敬仍含辛茹苦抚养氏牟之子。最终真正大白于天下, 氏敬被授记为“观音菩萨”。该剧巧妙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忍辱负重的伦理表达和中国观音慈悲为怀的普世救赎精神, 又展现了越南潮剧的独特的悲喜交织的艺术风格, 是中越两国在坚守各自美学特质的基础上达成的深层对话。此阶段的核心价值在于吸收异质戏剧的精髓, 并在交流碰撞中达成动态平衡, 为接下来的价值共识的凝结和情感纽带的建立夯基垒石。

戏剧周经由接触和对话阶段的不断积累, 最终将临时性的合作转化为稳定的共同体意识,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签订长期合作计划。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东盟各国文化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的《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明确把戏剧交流列为重点项目。此后, 中国-东盟国家发布的《关于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 就教育、青年人才培养、人文交流、智库建设等10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其二, 建立长效交流机制。2020年, “中国-东盟戏剧合作交流机制”正式启动, 目前已完成《中国-东盟戏剧剧本互译工程》第一期工作, 8国12部经典剧本得以翻译出版。截止2024年, 该机制成员单位已增加到142家, 覆盖面逐年拓展。其三, 创新戏剧人才培养模式。成都大学设立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东盟学院, 足见对培养双边人才的重视。由广西艺术学院牵头, 东南亚各国联合发起成立的“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旨在通过短期进修培训、教师访学交流、招收留学生、设置奖学金等形式选拔出符合“一带一路”和戏剧艺术发展需求的可造之材。

三、文明互鉴视域下共同体的价值跃升

戏剧作为承载各国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民俗风情、审美习惯等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长期交往中发挥其消弭隔阂、化解误会、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由此形成的戏剧共同体是双方“基于利益动机而在制度上相互吸纳、观念上相互包容、做法上相互借鉴所组成的联合关系，强调的是共同生存与共同发展的法则。”（康海玲，2019，p.19）戏剧共同体逐渐从戏剧交流拓展为更广泛的文化互动，并展示出东方美学的不朽生命力；从当代实践回溯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为人类文明根脉的传承赓续薪火；从区域性实践延伸至全球文明对话，其价值远远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范例。

（一）东方美学体系的现代重构

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相同的文化基因，其深入骨髓的东方审美成为艺术表达的重要指引。面对写实主义美学体系的冲击，戏剧这一传统艺术理所应当冲在前列，扛起东方美学体系重构和当代转化的大旗。在系统梳理与理论探究上，双方学者共同努力，完成了一部部鸿篇巨著。如《东方戏剧的当代浪潮》《亚洲戏剧史》《并非默然的两相遥望——东方戏剧思考集》《中国戏剧美学的多维阐释》等，助力戏剧艺术的知识普及与传播。在创新实践上，各国艺术团体加强合作，用精心编排的剧目演绎“虚实相生”“以形传神”“诗化叙事”的美学意境。中泰联合创排的改编剧《罗摩衍那》正是重要例证，它在保留史诗叙事内核的同时，融入中国戏曲的表演程式。诸如此类的尝试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活力，促使东方美学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当代篇章。

为应对表现形式单一、观众断层的困境，该共同体探索出一条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发展路径，既吸收传统艺术的精髓，又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其一，传统叙事与现代审美紧密交织。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正是将传统民歌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网络文化符号、前言舞台技术融合的成功实践。其二，人工智能与戏剧艺术的有效碰撞。“AI山歌对决刘三姐”创造性将人工智能引入到民歌对唱中，并利用机械臂精准演绎戏剧经典动作。同时，桂林象鼻山景区运用全息投影技术立体呈现戏剧场景，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这即是对现代技术的热情拥抱，也是戏剧艺术生生不息的动力。

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理论探索和联合实践中，戏剧共同体建立起既有传统内蕴，又具现代气质的东方美学形态。其作为全球戏剧艺术话语体系中一支，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握的戏剧艺术审美标准和评价体系，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美美与共”的戏剧对话模式。其以艺术为纽带，并推动更高层次的文化霸权到文明对话、西方中心到多元共生的深刻转变。

（二）戏剧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戏剧共同体从保护、传承、开发三个维度促进非遗戏剧的永续发展，也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提供样本。在机制建设和数字保护上，共同体建立了跨国协作的遗产保护机制，并利用数字技术形成了戏剧资源库，促进戏剧的保护与传播。其中，2012年，中国-东盟各国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交流机制建设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有关合作框架协议正在逐步推进。2023年至今，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已成功举办三届。众多参与国汇聚南宁，他们携带本国的非遗作品，共同聚焦非遗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并通过学术交流、传承人培训等方式，促进非遗保护经验的分享。此外，数字技术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腾讯SSV探元平台利用6DoF技术捕捉戏剧程式化动作、利用AI修复戏剧影像，建立起“戏曲数字资源库”。这一方式一方面保持了文化的本真性，另一方面拓展了戏剧保护的渠道方式，为东方戏剧参与全球艺术对话提升科技竞争力。

在传承模式革新上,戏剧共同体在传统口传心授的基础上,辅之以院校教育、社会实践、跨国交流等方式,以此搭建起立体化传承体系。高校高度重视非遗传承,开设民俗学、非遗保护等相关课程,组建各类非遗社团,举办非遗展览,培育兼具文化底蕴与国际传播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实施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成长计划、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等跨国项目,培养传承人才。同步推进的“戏曲非遗进社区”工程与清迈、西双版纳等地的跨国戏剧工作坊,有效拓展了戏剧艺术的受众广度和表现形式创新深度。

在产业开发上,戏剧IP不再是单纯的舞台表演,而是集展演、影视、游戏、旅游、文创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联动模式,解决戏剧传承造血功能不足,过度依赖政府支持的现状。其中,中柬合作的《吴哥的微笑》实景演出项目创造百万级观演规模,成为重要文旅品牌。戏曲动漫《梁祝》《牡丹亭·惊梦》《窦娥冤》等系列作品通过二次元画风重构经典叙事,吸引大量年轻观众,播放量破亿。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促进传统戏剧的市场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

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依靠保护机制创新、传承模式革新、产业价值开发的联动,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其中,“以地方传统戏曲之美,育青少年全面发展”“巴萨戏剧:为当地人提供体面就业”“龙目岛‘萨克族哇扬皮影偶戏’”等创新案例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2024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案例之中,为全球非遗传承指明了方向。

(三) 全球文化治理的东方方案建构

戏剧共同体是以戏剧交流为主要载体,带动更多类型的文化交流,从而辐射更大范围的文化治理。这一共同体是政府统筹规划、专业机构深耕细作、民间组织贡献力量的协同治理体系,同时以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底色,践行“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鉴理念,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形成更加广泛的、更具超越性的共生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治理架构上,共同体形成多维化的合作体系。政策层面,从中央到地方环环相扣的政策支持促使形成了以戏剧周、非遗周、文化节、文化年等为代表的对话平台。专业层面,媒体机构推出《美美与共》、“丝路名人中国行”等文化项目,高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从而与东盟艺术展览建立资源共享网络。民间层面,“文化走亲东盟行”系列活动走进9个东盟国家,在专业剧院、高校课堂、社区广场等场所开展近百场文化交流。这种上下衔接、左右协同模式,突破了传统政府单一主导的局限,让文化治理更具开放性与适应性。

在治理理念创新方面,共同体凭借东方“和而不同”的智慧重塑治理哲学。共同体坚持“不同”是世界各国的特质,也是形成“和”的基础;“和”是人类世界寻求长远发展的目标,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美美与共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戏剧共同体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交往环境,各国艺术都能得到尊重并获得展示的机会,同时能寻找到戏剧表演、剧目创作、传承保护等方向的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各国艺术繁荣发展和永久存续的方式方法。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是世界戏剧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的一环,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度的文化交流为全球文明对话树立了标杆,既希望本土戏剧与世界戏剧艺术对话,也希望各国摆脱文化霸权的控制,并在世界这个大熔炉中巍然屹立。

在价值验证方面,戏剧共同体通过双向文化流动机制深化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中国-东盟戏剧合作秉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理念,持续深化文化互信与交流。

“请进来”即以学习的心态,接受异质文化的观念和形式差异。通过邀请优秀剧团、艺术家、学者等来华展示和交流,吸收各国艺术精髓,开拓文化视野。“走出去”即打破固步自封的思维定式,

自信从容地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破解西方世界污名化中国的偏见，形成价值认同。这种双向互动、开放包容的艺术共情，超越了政治经济差异，证明文化合作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润滑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戏剧交流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形式，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载体，能有效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间民心基础的构建。“戏剧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超越国家、民族层面的更高的价值理念，彰显出全人类对‘共善’的追求。”（李琳琳、刘凡熙，2024, p.41）通过戏剧的交流与分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共鸣与理解得以加深，进而培育善意、弥合差距、增加对话、增进情谊和增添信任。在精神层面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合作观；在经济发展上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观；在国际关系中树立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全球观，为世界各国架起合作交流的友谊桥梁，成为民心相亲、共谅共筑的重要纽带。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其辐射效应，“大力开展区域或世界性文明对话，着力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文化共同体建设方案，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文化内涵，在文化治理方面形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成果。”（郭树勇，2016, p.69）文化的互动将以更高层次价值观念的融通反哺经济、科技、旅游等事业各领域，以文化认同滋养经贸互信，以科技协同催生创新动能，以旅游互通厚植民间情谊。这种立体化合作网络不仅推动着经济领域的互利共赢，更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即从单边霸权到多边协商，从零和博弈到共生发展，从短期利己到长效互利的转变，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使“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的主题和心声。

综上，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戏剧共同体以地理基质、族源迁徙和文化传播为生成逻辑，建立起政府、高校、民间三方协同的，包含“4+1”展演进路的三阶文化认同模式，并在东方美学体系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全球文明互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未来，该共同体将继续以戏剧交流为主体，但不限于戏剧交流的多元交流格局，强化其在民心互通上的优势，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助力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文化动能、夯实情感纽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85）的阶段性和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邓晓华（1994）：“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03）：36-40。
- [Deng Xiaohua (1994). "The Ancient Austronesian Elements in Southern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03):36-40.]
- 杜树海、郭健新（2023）：“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成果、争论与新的解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40-53。
- [Du Shuhai, Guo Jianxin (2023).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Austronesian: Achievements, Debates,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 40-53.]
- 范晔（2012）：《后汉书》。中华书局。
- [Fan Ye (2012). *Book of the Later Han*. Zhonghua Book Company.]
- 郭少东、吴潇（2023-12-08）：“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十周年交流座谈会发言摘登”，《南宁日报》，第4版。
- [Guo Shaocong, Wu Xiao (2023, December 8). "Excerpts from Speeches at the 1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f China-ASEAN (Nanning) Theater Week." *Nanning Daily*, 4.]
- 郭健新、邓晓华、王传超（2023）：“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和古基因组学观察”，《中国台湾研究集刊》（05）：31-47。

- [Guo Jianxin, Deng Xiaohua, Wang Chuanchao (2023). "Archaeological and Paleogenomic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Austrone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China Taiwan Region Research Journal* (05):31-47.]
- 郭树勇 (2016): "区域文化治理与世界文化秩序", 《教学与研究》(11): 62-70。
- [Guo Shuyong (2016). "Reg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World Cultural Ord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11):62-70.]
- 黄朝阳 (2020): "以文明交流互鉴开创中国-东盟合作新格局",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7): 104-107。
- [Huang Chaoyang (2020).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China-ASEAN Cooperation Through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People's Forum Academic Frontiers* (17): 104-107.]
- 康海玲 (2017):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剧传播》。文学艺术出版社。
- [Kang Hailing (2017). *The Spread of Drama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康海玲 (2019):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构建", 《福建艺术》(10): 18-23。
- [Kang Hailing (2019).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Theater Communit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ujian Arts* (10):18-23.]
- 李琳琳、刘凡熙 (2024): "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学习与探索》(09): 41-47。
- [Li Linlin, Liu Fanxi (2024). "Common Values of All Humanity: The Value Found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tudy & Exploration* (09):41-47.]
- 陇艺梅 (2019): 《神秘灵动——古滇国青铜雕刻艺术特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 [Long Yimei (2019). *Mystery and Liveliness: A Study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Sculptures from the Ancient Dian Kingdom*.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um, J., Cann, R., Martinson, J., & Jorde, L. (2000). "MtDNA Lineage Analyses: Origins and Migrations of Micronesians and Polynesi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02):151-168.]
-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2017): 《帝国之眼》, 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
- [Pratt, Mary (2017).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translated by Fang Jie and Fang Chen. Yilin Press.]
- 萨义德 (2003): 《文化与帝国主义》, 李琨译。三联书店。
- [Said, Edward (200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lated by Li Ku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斯皮克曼 (2014): 《边缘地带论》, 林爽译。石油工业出版社。
- [Spykman, Nicholas (2014).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translated by Lin Shuangzhe.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 约翰·汤姆林森 (2002): 《全球化与文化》, 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Tomlinson, Joh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Guo Yingjia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王介南 (1998):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 [Wang Jienan (1998). *Records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吴昌稳 (2019): "广东省博物馆藏'南澳 I 号'出水景德镇窑青花瓷图像研究", 《艺术与民俗》(01): 79-87。
- [Wu Changwen (2019). "A Study on the Images of Jingdezhen Kiln Blue-and-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the 'Nan'ao I' Shipwreck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Guangdong Museum". *Art and Folk Culture* (01): 79-87.]
- 许燕滨 (2024): "文化尊重 多元共汇大美——论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的人文交流实践", 《戏剧文学》(01): 20-26。
- [Xu Yanbin (2024). "Cultural Respect and Diverse Convergence of Great Beauty: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Practices of the China-ASEAN (Nanning) Theater Week." *Drama Literature* (01): 20-26.]
- 周宁 (2007): 《东南亚话语戏剧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 [Zhou Ning (2007). *A History of Theatrical Discourse in Southeast Asia*. Xiamen University Press.]